

全球对话

5.3

GLOBAL DIALOGUE

一年出版4期，以16种语言刊出

权力与原则

Walden Bello

社会科学与民主

Dipankar Gupta

照顾工作论坛

Brigitte Aulenbacher, Michael Fine, Hildegard Theobald, Yayoi Saito,
Roland Atzmüller, Almut Bachinger,
Fabienne Décieux, Birgit Riegraf, Monica Budowski,
Sebastian Schief, Daniel Vera Rojas, Elena Moore
and Jeremy Seekings

今日的社会学

- > 俄罗斯社会学的新方向
- > 捷克社会学的冒险
- > 世界规模的社会科学问题
- > 国际视野下的专业
- > 谢谢，Nacho！

MAGAZINE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第5卷/地3期/2015.9
<http://isa-global-dialogue.net>

GD



> 主编的话

迈向公共、迈向比较

在这期的《全球对话》我们从两篇亚洲的文章开始：一篇是菲律宾、一篇是印度，分别是由两位知名的公共知识分子撰写的。Walden Bello 和其他参与政治社会学者类似，例如《全球对话》访问了 Henrique Cardoso，巴西的总统（《全球对话》3.4 期），以及 Nicolás Lynch，秘鲁的教育部长（《全球对话》4.2 期），Bello 描述了在代表政党 Akbayan 和个人信念之间的紧张关系。他是一位全球发展的重要作者，也是菲律宾共产党员，并且长期以来对抗世界银行和 Marcos 独裁之间的共谋。而印度社会学家 Dipankar Gupta 则是另外一位公共知识分子，也是杰出的学者，在发展组织和国家委员会里面担任要职，让他更接近权力核心进行观察。他阐述了民主与社会科学的关系。

我们也跟着这些公共参与的脚步，探讨了这个时代最重要但是社会学家长期以来没有太重视的议题：照顾与照顾工作。Brigitte Aulenbacher 把多篇文章汇整起来，比较了儿童和老人照顾的市场化分别在澳大利亚、德国、瑞典、日本、西班牙、澳洲、智利、哥斯达黎加、南非等国。很高兴可以看到 ISA 研究委员会的重要比较成果。

而另外两篇年轻学者的文章是关于俄罗斯的社会学。公共社会学实验室挑战了两个传统：“工具主义”的政策研究，由国家和企业精英所主导，以及专义社群“自主主义”，滑进私有的无关痛痒研究之中。该实验室追求第三条路，就是批判介入，建立和公民社会的合作，并且不牺牲科学的严谨。第二篇俄罗斯的文章是一个图文报导，探讨 St. Petersburg 的建筑如何体现了早期苏维埃时代社会主义的理想。现在是时候让年轻一辈的社会学家去复苏那个既伟大又悲剧的 20 世纪社会主义实验的想象了。

我们还有来自捷克的有趣文章，分别是捷克在英国的帮佣移民，以及 Roma 移民的展览，还有在家教育的处境。另外也有对于专业的社会学讨论，以及世界规模社会科学之探讨。最后，我们要跟 José Ignacio Reguera，人称的 Nacho，说声再见。他是 ISA 办公室 30 年的资深员工，默默地帮助这个组织顺利进入 21 世纪。同时，我们也欢迎印度尼西亚的编辑团队，这让《全球对话》扩充到了 16 种语言。

全球對話以 16 種語言刊出，請至 [ISA website](http://isa-berkeley.org)。
投稿請寄給 burawoy@berkeley.edu



Walden Bello 是一位世界知名的菲律宾社会学家。他反省了参与政治的挑战和失望，解释为什么要辞掉国会议员一职。



Dipankar Gupta 是印度的社会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检视社会科学和民主的关系。



Brigitte Aulenbacher 是奥地利的社会学家，把许多全球对于照顾工作的文章集合起来。



Global Dialogue 由 SAGE 出版社提供赞助。

> 编辑团队

主编:

Michael Burawoy.

执行主编:

Gay Seidman.

副主编:

Lola Busuttil, August Bagà.

編輯顧問:

Margaret Abraham, Markus Schulz, Sari Hanafi, Vineeta Sinha, Benjamin Tejerina, Rosemary Barbaret, Izabela Barlinska, Dilek Cindoğlu, Filomin Gutierrez, John Holmwood, Guillermina Jasso, Kalpana Kannabiran, Marina Kurkchian, Simon Mapadimeng, Abdul-mumin Sa'ad, Ayse Saktanber, Celi Scalón, Sawako Shirahase, Grazyna Skapska, Evangelia Tastsoglou, Chin-Chun Yi, Elena Zdravomyslova.

区域编辑

阿拉伯:

Sari Hanafi, Mounir Saidani.

巴西:

Gustavo Taniguti, Andreza Galli, Ângelo Martins Júnior, Lucas Amaral, Rafael de Souza, Benno Alves, Julio Davies.

哥伦比亚:

María José Álvarez Rivadulla, Sebastián Villamizar Santamaría, Andrés Castro Araújo.

印度:

Ishwar Modi, Rashmi Jain, Pragya Sharma, Jyoti Sidana, Nidhi Bansal, Pankaj Bhatnagar.

印度尼西亚

Kamanto Sunarto, Hari Nugroho, Lucia Ratih Kusumadewi, Fina Itriayati, Indera Ratna Irawati Pattinasarany, Benedictus Hari Julawan, Mohamad Shohibuddin, Dominggus Elcid Li, Antonius Ario Seto Hardjana.

伊朗:

Reyhaneh Javadi, Abdolkarim Bastani, Niayesh Dolati, Mohsen Rajabi, Faezeh Esmaeili, Vahid Lenjanzade.

日本:

Satomi Yamamoto, Masahiro Matsuda, Fuma Sekiguchi, Taiki Hatono, Hidemaro Inouye, Shinsa Kameo, Kanako Mataka, Shuhei Matsuo, Kaho Miyahara, Noriko Nishimori, Shintaro Oku, Fumito Sakuragi, Yutaro Shimokawa, Mayu Shiota, Masaya Usui, Tomo Watanabe.

哈萨克:

Aigul Zabirowa, Bayan Smagambet, Gulim Dosanova, Daurenbek Kuleimenov, Ramazan Salykzhanov, Adil Rodionov, Nurlan Baygabyl, Gani Madi, Galimzhanova Zhulduz.

波兰:

Jakub Barszczewski, Mariusz Finkielsztejn, Weronika Gawarska, Krzysztof Gubański, Kinga Jakiela, Justyna Kościńska, Martyna Maciuch, Karolina Mikołajewska-Zajac, Adam Müller, Zofia Penza, Teresa Teleżyńska, Anna Wandzel, Justyna Zielińska, Jacek Zych.

罗马尼亚:

Cosima Rughiniș, Corina Brăgaru, Costinel Anuța, Adriana Bondor, Ramona Cantaragiu, Alexandru Duțu, Irina Cristina Făinaru, Ana-Maria Ilieș, Ruxandra Iordache, Gabriela Ivan, Mihai-Bogdan Marian, Anca Mihai, Adelina Moroșanu, Monica Nădrag, Radu Năfornîț, Oana-Elena Negrea, Elisabeta Toma, Elena Tudor.

俄国

Elena Zdravomyslova, Lubov Chernyshova, Anastasija Golovneva, Anna Kadnikova, Asja Voronkova.

台湾:

Jing-Mao Ho.

土耳其:

Gül Çorbacıoğlu, İrmak Evren.

媒体顾问: Gustavo Taniguti, José Reguera.

编辑顾问: Ana Villarreal.

> 本期内容

主编的话: 迈向公共, 迈向比较 2

权力和原则: 一个社会学家在国会的起落
by Walden Bello, 菲律宾 4

社会科学和民主: 选择性亲近
by Dipankar Gupta, 印度 8

> 国际视角的照顾工作

全球视野的照顾工作
by Brigitte Aulenbacher, 奥地利 11

在澳洲把照顾工作重构成为市场经济
by Michael D. Fine, 澳大利亚 13

长期照护: 德国和日本的比较
by Hildegard Theobald, 德国, Yayoi Saito, 日本 15

澳洲和德国照顾工作的变迁
by Roland Atzmüller, Brigitte Aulenbacher, Almut Bachinger, Fabienne Décieux, 奥地利, Birgit Riegraf, 德国 17

危险环境下的的家庭照顾: 智利、哥斯达黎加、西班牙
by Monica Budowski, 瑞士; Sebastian Schief, 瑞士; W. Daniel Vera Rojas, 智利 20

南非照顾工作的限制
by Elena Moore and Jeremy Seekings, 南非 22

> 俄罗斯社会学新方向

充满敌意环境里的社会学
by the Public Sociology Laboratory, 俄罗斯 24

早期苏维埃建筑的社会主义理想
by Natalia Tregubova and Valentin Starikov, 俄罗斯 26

> 捷克的社会学冒险

雇佣移民作为成年礼
by Zuzana Sekeráková Búriková, 捷克 29

在家教育: 捷克教育的自由和控制
by Irena Kašparová, 捷克 31

在捷克记得Roma工人
by Kateřina Sidiropulu Janků, 捷克 33

> 特辑

世界规模的社会科学
by Ercüment Çelik, 德国 35

国际视角下的专业: 打开黑盒子
by Ellen Kuhlmann, 瑞典; Tuba Agartan, 美国; Debby Bonnin, 南非; Javier Pablo Hermo, 阿根廷; Elena Iarskaia-Smirnova, 俄罗斯; Monika Lengauer, 德国; Shaun Ruggunan, 南非; Virendra P. Singh, 印度 37

谢谢, Nacho!
by Izabela Barlinska, 西班牙 39



> 权力与原则

一个社会学家在国会的起落

by Walden Bello, 退休教授,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at Diliman, 前菲律宾众议员, 2009-15



Walden Bello 是一位菲律宾社会学家，国际上相当有名，也是公共知识分子。他出版的书籍主要是关于发展的政治，包括了 *Anti-Development State* (2004), *Food Wars* (2009) and most recently *Capitalism's Last Stand? Deglobalization in the Age of Austerity* (2013)。除了是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的教授之外，他也负责了一个在美国为主的 Institute for Food and Development Policy (Food First) (1990-94)，同时也是 Bangkok 为主的机构 Focus on the Global South 的创建者。他也是世界上报纸专栏的常客，也是许多国际奖项的获奖者，包括了 Right Livelihood Prize (Alternative Nobel Prize) 和国际学术学会的杰出公共学者奖。这里他叙述了社会学家参政的难题。他是菲律宾反对党 Akbayan 的一员，也是众议员。他也是 ISA 世界大会的 (2014 年横滨) 全体场次演讲者。这篇文章的全文可在 Global Express 上找到。(注 1)

Walden Bello.

我

生命中大多时候是社会学家和社运者。在1975年的时候，我是Princeton的社会学博士，然后立即投入成为全职的行动者，并且推翻了Marcos的独裁政权，成为了National Democratic Front的国际分支成员，然后激进反对全球化。从1994到2009年，我在Diliman的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教社会学。2009年，我成为了一个菲律宾进步政党的成员，并且是众议员。

我所属的政党叫做Akbayan，是一个1998年成立的进步政党，到2009年为止。它透过国会的法案，包括生育健康法案、农业改革法案、反对歧视LGBT法案、海外的菲律宾人投票权、公安法案、社会住宅提供给都市拼穷等等，展现出相当的进步性。

2009年，该政党辩论是否要支持2010总统大选的Liberal Party (LP)的候选人，这是一个关于候选人是否有办法执行改革政纲的辩论。虽然LP的候选人应该不可能推动财富重分配、参与民主、或是国家安全，许多我们政党的支持者都认为LP会带来好的治理和反贪腐。这是一个人民强大的诉求。

虽然说当LP的反贪政纲相当明确，我们也期望他们的候选人可以在其他议题上也有明确的进步性，像是生育健康和农业改革。2010年之前，长期辩论的生育健康法案变成了立法讨论的核心，可是最近刚通过的农业改革法案那时候却还在等待被注意到。此外，我们希望可以推动其他关键的议题，包括独立的外交政策，反对自动接收法案，此法案优惠外国和本国的债务。并且反对新自由主义的贸易、财金、投资法案。

LP的候选人Benigno Simeon Aquino III是前争议性总统Corazon Aquino和烈士Benigno Aquino的小孩，他在2010年胜选了。而后来的5年来，作为Akbayan的立法者，我有第一手的交手经验，以机会观察那些由自由派和传统派政治人物所联合把持的国会如何把机会给了进步政党。

>在文化前线的胜利

菲律宾的进步派已经长期以来寻求政府支持的家庭计划方案，好去处理贫穷和女性生育健康的问题。2010之前，当新的政府上台之前，我的党和其他进步派已经让生育健康法案在议会之中持续了12年。尽管从罗马天主教来的强力反对，进步派已经建立了多阶级的联机，重新从女人的生产权利和健康的角度去做。这是一个获胜的论述。2012之前我就成功联合了保守组织和统治精英，还有中产阶级，于是法案通过了。

>农业改革：阶级的困难现实

然而农业的改革证明了联合政治的困难，特别是遇到阶级利益的时候。虽然土地改革的努力可以被追溯到早期的1960年代，但是不平等依旧存在。在1970年代，Marcos独裁的土地改革面临了地主的强烈抵抗，所以暂停了。在1986年Marcos被推翻之后，Corazon Aquino的政权进行了一个很有野心的计划，要重新分配10.3百万公顷的土地，是为了回应New People's Army的农村起义。可是，国会在地主把持，让法律有漏洞，所以重分配只限定在公共土地。所以那些很有价值的私人土地都没有被动到。

在我在国家的第一年里面，Akbayan成功地资助了一个新的农业改革法(CARPER)，提供了足够的资金给土地征收和解决法律漏洞的改革。这个法案之所以会通过是因大地主的国会议员有些死掉了，而且人民诉求农业正义的运动又起来了，有农民组织游行了1,700多公里，从Mindanao岛到总统官邸。

可是即使有法律通过了，政治意志还是要有的，才可能实行。从法律通过之后，总统就忽略而且不想面对地主，让700,000多公顷的合格土地无法运用，那些包括了这个国家最好的土地。所以农业改革停止了，是因为地主反抗、总统忽略、官僚无能所导致。而总统对改革的忽视也是2015年三月辞职下台的原因之一。

>>

>良好治理的失败

让我最后谈谈我的政党经验。关于良好治理，LP所作的承诺对于打击贪腐来说是很认真的，这也是位什么我们愿意参加他们的联盟的原因。可是这也是让我辞职的原因。

Aquino政权的前五年就是要求有良好治理的。作为Akbayan的主要议员，推动这个改革当然是很棒的，也包括了起诉前总统Gloria Macapagal Arroyo的贪污。而2013年5月的选举被很多人包括我在内诠释为是对于自由派的信任投票。

可是蜜月期并不久。菲律宾的政治系统有一项被称为“pork barrel”或是“Priority Development Assistance Fund” (PDAF) 的制度，也就是从美国殖民时期就存在着的制度，就是总统分配一些资金给国会议员去推动他们的计划。后来我马上发现到一位很擅长这种政治技巧的Janet Lim-Napoles设立了一个假的组织，为的是可以得到这个资金，然后为自己做事。这个案例让许多人起了反对声浪，要求取消PDAF。我深信我的党会坚守原则，要求取消这个制度，拒绝总统的资金。可是我的这个意见被否决了。

很快的又有另外一个丑闻爆发，是关于总统数百亿的资金分配制度：Disbursement Acceleration Program。这个不透明、不负责、不谨慎的公共资金制度让该政府做了其之前指控前政府不该做的事情。而当最高法院认定违宪时，我认为总统该做出决定了。

当我要求我的政党去问总统是否要求相关政府官员下台负责的时候，有些党员反对，认为这只会让总统更加顽固，我觉得这是一个进步政党能想出来的最烂理由了。我认为这个政党领导阶层无法再带领这个政党了，所以我写信给总统，从一个公民的角度去要求总统开除预算部门的首长，“因为这样快速但粗糙的资金操作太过分了！”我也认为，这个制度开启了“总统的恩辟侍从管道，违反的宪法的权力分立原则。”因

为“行政部门直接分配资金给国会。”

我的信引起了领导阶层的紧张。许多成员认为我没有权利私自写信给总统，因为作为党员，个人意见本来就是一种该取舍的东西。这是党的高层这么说的。

当我们内部的辩论持续时，政府历经了第二次是败：2015年1月25日，在Mindanao的反恐任务变得警戒，也让国家的霹雳小组的44位成员死亡，加上18个Moro Islamic Liberation Front分离主义的成员的死亡。政府曾经和该组织协商过自治协议。

“Mamasapano raid”代表了坏治理的案例。第一，总统拒绝负起责任，这违反的总统的领导原则。第二，他违法命令已经因为贪污而被暂停值勤的国家警察。第三，他的命令以美国的利益为主，而不是菲律宾的利益优先。所以我为了良好治理，我要求总统负起全部责任。

当政府的正当危机越来越严重时，我要求Akbayan要推动改革。而当总统在一个很弱的道德地位时，我认为我们应该给他压力，负起责任，并且解除那些贪腐无能官员职位，要推动良好治理的政纲。可是我的政党的领袖拒绝了。

若是没有办法把要求总统改革贪腐的责任扛起来，那我也不想代表这个政党了。

所以我认为党的高层是错的，我也不需要为这个党背书，我也不同意该党立场，也不支持总统。没有人要求我辞职，可是党的规则很清楚。我在2015年3月19日辞职。

>主要课题

透过这些叙述，我已经强调了我追求3个目标所学到的事情：生育健康、农业改革、良好治理。

而生育健康的努力解释了文化课题提供了一个进步政纲可以推展的场域，并且可以透过结盟和论述策略达成。在家庭计划的那场战役中，支持生育健康的

>>

力量得以开启上层和中产阶级的罅隙，这是透过用女性生产权利的论述取代人口控制的论述，开启了通过法案的大门。

农业改革的经验则提醒了我们要透过非革命的政治氛围下去对于结构性不平等的有效打击是多么困难。虽然进步力量已经试图去形成有利的立法结盟，但是农村的不平等仍然很严重，这是因为总统的忽略、官僚的胆怯、以及地主的反抗。

第三个例子，就是争取良好治理，虽然有着痛苦的个人和政治结果，但也帮我上了一堂课。其中一堂课就是结盟是动态的，在这个个案中，结盟改革会变成其他的东西。第二是进步的政党必须继续评估其结盟的参与，任何利益相关

的政党，包括执政党，其利益都会相互冲突，所以在每一个关键点，政党都要再评估结盟，看看根本的价值有无相互冲突。

第三堂课：有时候，在政党意见和其国会代表意见是会不一样的。这里，进步派必须遵守良心，甚至要反对政党的领导。作为进步派意味着要去想象一个平等、政治、团结、主权的社会，并且有一个政治纲领去实现这些目标。但是也意味着占据一个道德的立场。或许一个进步派的政治人物最特别的就是其道德行为。对我来说，作为一个进步派是守住原则和价值，即使位置、财产、生命受都威胁，都不退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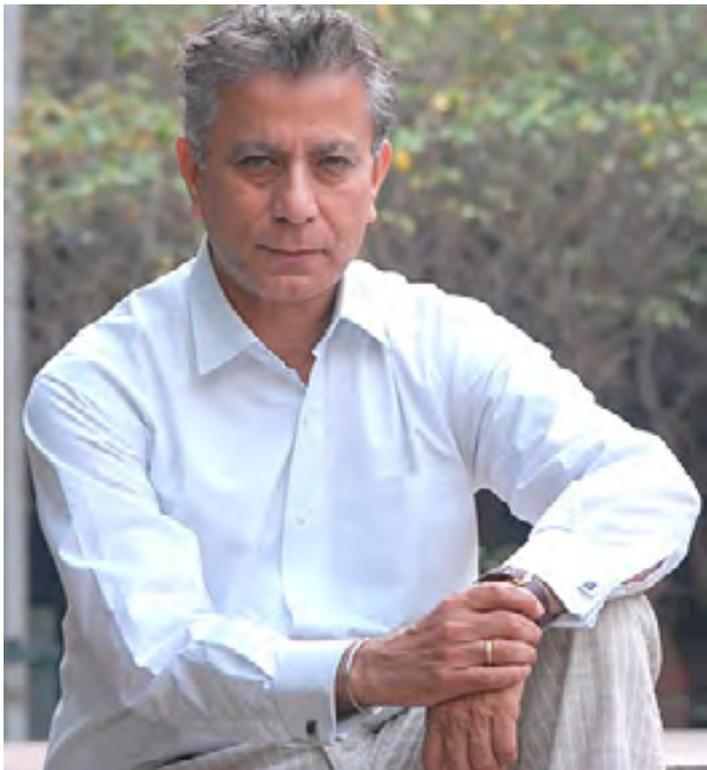
来信寄给Walden Bello <waldenbello@yahoo.com>

注1: <http://isa-global-dialogue.net/power-and-principle-the-vicissitudes-of-a-sociologist-in-parliament-july-4-2015/>

> 社会科学和民主

选择性亲近

by Dipankar Gupta, Shiv Nadar University, New Delhi, 印度(注1)



Dipankar Gupta.

Dipankar Gupta 是一位杰出的印度社会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他现在也是 Shiv Nadar University (位于 New Delhi) 的公共事务和批判理论中心的执行长和教授。在将近 30 年来,他都在 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 教书,而且著作等身,编辑和写作有 18 本书,并且触及了各种印度后殖民转变的议题。他最近的书:《从上而下的革命:印度的未来和公民精英》认为民主的前进是透过由上而下的介入得以可能。他也是 The Times of India 和 The Hindu 的专栏作家,并且也透过种种管道参与公共事务,包括了 Reserve Bank of India 的执行长和 National Bank for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 的执行长。他也是 Toronto, Paris, 和 London 等地的访问学者,并且到过美国多所大学担任资深研究员。2010 他获颁法国政府的 Chevalier of the Order of Arts and Letters 荣誉。这篇文章的完整版可以在全球对话上找到。(注 2)

你 有想过,为什么包括哲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只会在民主社会里面茁壮吗?有些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像是沙特阿拉伯、中国、俄罗斯等,他们有很强的自然科学,可是社会科学却不是很茁壮。中国和俄国的电子、物理、医学、交通等很先进,可是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甚至历史等,都落后许多。只有民主国家会拥有强大的社会科学吗?如果是的话,为什么?

有些人会说民主和社会科学的选择性亲近性有个肤浅的骄傲,那就是这其实是西方文化的产物。或许社会科学只有在欧洲或北美才是个中立学科?许多非西方的社会科学批判家推

动本土的类别,对抗霸权的社会科学。但是这样的方法忘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社会科学发展不过是最近的事情,在美国和欧洲也是如此。这些知识系统对于他们来说也曾经是新的,并不是从中古世纪所传承下来的。

在民主时代以前,追寻社会科学的条件并不存在。数据也没有,不论对于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来说,都不可能形成。社会科学是在新的脉络下诞生的,只有新的事实变得相关之后,才得以可能推动了社会科学的形成。

只要知识包括了从上而下传授来的信念,不论教堂或是国家,世俗主义是不可能的,直

>>

到了人们可以问：“在我相信你之前，先证明给我看”，社会科学才得以可能，所以世俗主义是关键，因为研究人们的行动。生活不是固定不动的，因为脉络不同，地域和历史也都不同。自然科学有更多的自由，比如说水可以止渴，彩虹在天上，而火则带来烟和光。这些都不需要民主，也不会变。但是社会科学并非如此。

对于社会科学来说，去解释我们的发现，并且了解其他人怎么影响我们，甚至定义之，这些都是相关的，不，是基本的！这个观点是很重要的，而且在过去并不存在。早期，社群、群体、村落、阶级、血亲等等，都住在一起，但是没有所谓的社会。广大且规律互动的情形，并且超越原始的社会连带，这是很根本的社会科学问题，并且也是历史上新的事件。社会到来之后，我们不再可能用以前的组织原则区分人群，我们也了解“他者”变成了重要的一环，甚至是我们自身重要的一环。

在民主国家中，这样的体认变成了非常重要。政策或是经济的方案都要考虑到多重的利益，甚至那些最弱勢的群体。英国的 1834 贫穷法案是建立民主社会的重要一步。这寓意着劳工不再和破烂的房子绑在一起，可以自由移动去找工作。

民主在一个新的宏大的事实上面。从一开始，我们开始去接受人类做为一个理性目标追求者，可以自由选择。有了选择，就有错误，错误是学习的代价，因为有错误才有创新。

这意味着什么？当个体的错误没有被处罚的时候，那就有改进和创新的空间。弱势民主的法则没有被违反，错误是受到欢迎的。民主给予了许多条路，允许不同的方式，像是教育孩子、婚姻生活、选择职业、交友等。过去这些选择都不存在。但是在民主社会，甚至那些保守的人都要节制其原始的冲动。

经过了多次的试验与失败，于是组成了社会科学的经验材料。从个人的观点来说，犯错或许是不幸的，但是对于社会科学而言，错误是基本的，也让社会科学家有数据和概念。民主是社会科学的必要条件，因为对错误的接受会变成非例外的。

想象你是一个前民主社会的经济学家，对于所有可行的目标来说，市场是确定的，而买方和卖方在一开始就给定了。中古世纪的“karkhanas”（工厂）生产产品了给一定类别

的买家。需要技巧，但不是企业，也不可能有经济错误。冒险不会发生，因为买卖都是固定的。当土地固定，劳动力也不能移动，位阶也一开始就固定，这也是为什么经济学在那个非民主的时代并不存在，因为没有“看不见的手”，没有市场均衡，没有判断错误，经济活动也不会变动甚至破产。

然而在多重认同的脉络中，一个民主国家必须有经济活动。虽然市场的隐形之手运作着，有时候国家的手也是必须介入，才达到社会平衡。若是政府不做，让给其他阶级或是行动者的利益主导，那么经济会更缓慢复苏，这就是显示了民主中体认到他者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利益交会，而且允许犯错。

经济学作为一个学科，若没有预设人会犯错的话，是不会有现在的经济学的。现在是量化宽松的时机吗？汇率应该降低吗？在威权的国家，这样的问题是不能被问的，因为决策是由上而下。民主国家中，我们总是可以坚持“证明给我看”。

相似地，透过把权威和权力分开来，政治学这门学科也有赖于民主。在过去，掌权者有权力，但是并不一定有权威。但是民主，其他人的声音必须算进去。所以民主接受利益的多元，这是必要条件。冲突的看法看目标必须在自由和公平的选举下表达出来，不论是哪个政党拥有权威，都不是听神的、国王的，而是人民的。所以未来胜利，希望得到权威的人必须平衡不同的利益，农业、工业、白领阶级等等。所有的类别下面还有次类别，让那些政治人物必须听到“他者”的声音。

对于政治学来说，系统容纳人们犯错和更正这点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些都是需要规则。犯错会失去权力。在民主国家，那些掌权的人不可以把权力当作给定的，投票可以改变意志，而且也是被鼓励的。没有了民主，就没有选择，没有选举，没有批判，也没有反对政府的机会。

社会学主要目标是去理解社会现象，并透过阶级、分类、性别、职业群体。社会实践，像是婚姻，是在真正的实做中或是透过不同的角度去检视和研究的，像是阶级、卡司特、宗教、职业等的影响，这就是一种体认到“他者”而有的问题意识。

对于流行的实在的概念的抵抗，或是说，本质主义，社会学有意识地更深层钻研了比较方法，研究不同时空的比较案例，让学者可以

>>

中立且批判。透过比较我们可以研究社会现象的普遍法则，不论是宗教、婚姻，社会偏好，也可以了解社会事实怎么样在不同的环境下可能不同。

所以，社会学和民主的连结是很简单易懂的：在体认到的“他者”的脉络之后，这个学科定义了自身，也研究人们跨越文化和经济的疆界的互动，这就是社会学的特质之一。

在非学术的环境中要如何去问这些问题呢？没有民主所保障的自由，任何的质问会被认为颠覆性的。民主则可以滋养这些问题，因为是竞争的，也是检视怎么满足各方的利益。

社会学可能有点是行动的，或是让政策制定者可以推动立即的利益。这是对于这个学科的理解。但是，民主国家的政治人物是可以从社会学得利的，若是政策制定者想要一个问题的全部图像，那么他们应该借助于社会学。

可是当社会学家像是社会运动者时，他们有风险，也就是让数据削足适履。社会学可以去问一个整体的改变图像，也因此会造成许多争论，反而掩盖了整个全体面貌。但是社会学家还是可以帮得上忙的，那就是透过想象出一个更包容的社会，产生更多的参与，更大的包容。社会学的核心有赖于人们会犯错，但是会试着改变，然后追求目标，不被命定。

类似的论证对于历史和哲学来说也成立。历史是对现在的迷恋。我们从有限人生的至高点看过去。在民主国家里，对过去的检视让我们可以接受过去的缺点，并且承认过去怎么影响了现在。没有这个的话，历史仍然是无色彩的编年，或是彩色传记，两者对于学术来说都没什么用。

相似地，哲学被民主的到来转变了。所谓的“自我”，从笛卡儿到康德，宰制了西方的社会学，也已经挪出一些空间给“他者”，这个转变不应该被看成是容纳，而是组成的，因为今日的哲学很清楚地承认若没有他者就没有自我。若是民主意味着要关心“他者”和允许

错误，我们应该谈论“公民身份”，也就是民主法律和治理的基石。民主的宪法和惩罚法律是预设“他者”是一个道德行动者，在本体论上和我们类似，也互补。

当“他者”成为了核心的时候，也当对于“错误”的接受是常态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在讨论公民身份。社会科学家试图要强化公民身份，因为这么做可以巩固他们的学科。而民主的力量也可以被这个国家社会科学的强弱所判断。选择的自由，对错误的开方态度，对他者于我们的影响的理解，这些都是只能给民主国家的公民的。所以，社会科学不可以被看成是西方的或是欧洲的。若有的话，那应该是以公民为中心的学科。■

来信寄给 Dipankar Gupta <dipankargupta@hotmail.com>

注 1: 谢谢 André Béteille 教授和 Deepak Mehta 教授的评论。

注 2: <http://isa-global-dialogue.net/social-science-and-democracy-an-elective-affinity/>

> 全球视野的照顾工作

by Brigitte Aulenbacher, Johannes Kepler University, Linz, 奥地利, ISA经济与社会委员会委员(RC02), RC19委员, 工作社会学委员(RC30), 女性与社会委员会委员(RC32), 第三届ISA论坛在地筹备委员会副主席(Vienna 2016)



| Arbu绘。

工作的兴趣一直在增加，这个主题是一个快速变化的领域，而且社会学家也越来越多人研究这个领域里发生的多元现象与不平等。

> 照顾的危机和全球的照顾短缺

社会学对于中高收入的国家的研究里面，照顾的研究反应了在 80 和 90 年代开始，包括了新公共管理模式在 OECD 国家的实行，以及照顾商品化，另外还有照顾提供在日常生活的挑战。

一方面，所谓的照顾工作产业正在演变中，而私人的家庭也越来越多雇用移民工作者，特别来自东方和南方的移民。另外一方面，福利国家在南欧和东欧是缩减中的，西欧也是如此，后 2008 的财政撙节开启了新的照顾危机，这个危机被忽视了，因为照顾和照顾工作总是被社会化所吸收和忽略。

但是中间收入等级的南方

>>

照顾和照顾工作，自我照顾或是照顾他者，在日常生活或是整个生命历程，家庭或是亲属，专业、国家、市场、公民社会提供照顾服务，这些议题对个人和社会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可是长期以来这些议题是被忽略的，或许是因为照顾总是在私领域中是看不见的，或是在公领域中被贬低的，对于性别化和族群化的劳动来说特别如此。

几年来，社会学对于照顾

国家由于经济成长让新的社会服务和福利扩张，照顾工作也被公部门所支持和强化，穷人、小孩、老人、残疾人士都受惠，并且渐渐扩展到其他人口。

现有对于照顾工作的社会文献也指出了这样的发展，而下列的文章也提供了比较全球北方和南方照顾工作制度的比较与发现。

> 全球北方和南方的照顾制度

从全球的角度来看，下面的文章比较了不同国家的经验，聚焦在私人家庭、亲属、公民社会、国家、市场之间的互动。这些文章提供的了四个观点。首先，市场化的进行与取向。第二，商品化和去商品化间的复杂关系。第三，照顾商品化不仅对于照顾工作重要，也对照顾提供者和接受者提出了问题。最后，文章都显示了检视地方、国家、国际的照顾工作脉络之重要性。

Michael D. Fine 描述了奥地利的照顾工作制度怎么在市场化和国家之间被重构。照顾工作者的工作环境和工作内容，以及被照顾者作为消费者，这些怎么历经了根本的变迁，在专业化和去专业化之间怎么样摆荡。Hildegard

Theobald 和 Yayoi Saito 对于瑞典和日本的比较显示了国家政策怎么转变和采用了新的观念，怎样和分工连结。尽管在这两个国家之间存在着差异，但是专业的长期照顾在两个国都被若化的公共照顾服务政策所威胁。

Roland Atzmüller, Brigitte Aulenbacher, Almut Bachinger, Fabienne Décieux 和 Birgit Riegraf 呈现了他们关于奥地利和德国从福利国家到投资型国家的发现，描述照顾工作如何成为一个竞争的场域，如何形塑了移民工，专业照护、社会抗争和其他的照顾观点。Monica Budowski, Sebastian Schief 和 Daniel Vera 告诉了我们智利、哥斯达黎加、西班牙的比较结果，叙述了儿童照顾的结构和性别分工，特别是在经济不稳的家庭内是怎么被福利国家、市场、家庭、国家的照顾提供者所影响。Elena Moore 和 Jeremy Seekings 重构了南非福利国家的历史，强调了从种族隔离到后种族隔离的历史转变。面对 AIDS 和孤儿等的问题，还有老人和儿童，国家是主要的照顾提供者，可是家庭、亲属、甚至市场都是南非照顾工作场域的重要因素。总之，这些文章呈现了多元的脉络和结果，以及不同国家如何同样把

照顾商品化的经验。(注 1) ■

来信寄给 Brigitte Aulenbacher
<brigitte.aulenbacher@jku.at>

注 1: 对于这个的延伸讨论与观点，请见 Soziale Welt (Sonderband 20), "Sorge: Arbeit, **Verhältnisse**, Regime" [Care: Work, Relations, Regimes], 2014 (Brigitte Aulenbacher, Birgit Riegraf, Hildegard Theobald 编辑)。

> 在澳洲把照顾工作

by Michael D. Fine, Macquarie University, Sydney, 澳洲, ISA老化研究委员会委员(RC11)



<http://www.childcaresales.com.au/>

Past wearyin' or carin',
Past feelin' and despairin';
And now I only wish to be
Beyond all signs of cari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9pqht2Ph04>)

接连的几任澳洲政府，包括劳动党和自由国家党，都为了寻求民众的支持而声明要去扩张社会照顾的服务。但是这个新自由主义和财政撙节的时代，他们采用了新的成长政策，因此也限制了非营利和公共照顾服务，助长了市场导向的照顾。服务使用者成为了“消费者”，有付费才有照顾。

幼儿教育中有一大部份是非营利性的，但在澳洲却是一门产业。

W alzing Matilda 似乎是一首很鼓舞人的歌曲，是关于一个无家可归的工人拎着自己的寝具（拎着行囊），然后边找着头路。这就是大家熟知典型的澳洲工人模样，19世纪的时候工业化的畜牧业是这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另外一首经典的同期澳洲民谣是 Past Carin'，可以成为新时代的主题，因为重构的和市场化的照顾供给逐渐形塑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这首歌以 Henry Lawson 的诗歌词，是这样唱的：

> 照顾：社会学的诊断

我们知道照顾是人类一生的基本需要。可是对于照顾的理解仍然是个学科的盲点。从最基本的国际或是跨国文化比较可以知道，一个社会的照顾组织原则反应了该社会的运作方式。分析照顾因此可以提供一个强大的社会诊断，也是一种理解社会关系的方式，去理解那些最脆弱群体，以及一个社会的结构和权力体系。

>>

虽然女人已经被期待去提供家庭内的无偿照顾，但是 20 世纪照顾的重要性已经超越家庭的范围了。当女性的就业率提高之后，对于照顾的需求也增加了。澳洲的政府和其他国家很像，也为了响应这样的需求而开始提供有偿和正式的照顾。

尽管经济的变迁，澳洲已经很大的程度上扩张了照顾的供给，并且在组织、经费、供给上都有很大的变化。这些变迁涵盖了许多领域，从婴儿的照顾到儿童的照顾，从残障的支持到老人照顾。虽然每个部门都有特别之处，但是这些特殊之处不应该遮蔽了更大的结构转变，或是遮蔽了相同的机制。因为这些机制可以解释政府和市场对于照顾需求的响应。

> 老人和残疾照顾的改革

澳洲的老人照顾的变化被对于增加的需求所做出的响应所影响甚大，那包括了公共的成本。这个变迁奠基在以 50 年为蓝图的改革方案上，而且也试着改变整个系统的主要元素，并且所有层级的照顾费用都提高了。而对于市场的机制也愈益依赖，这鼓励了私人的营利照顾提供者去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

不像早期的方案，新的家庭支持方案是全国性的，并且各州差异很小。澳洲的残疾照顾改革也采用了全国性的措施，也是为了响应增加的残疾人口，同时也是出于人道的考虑，缩小不平等的差距。

像是在老人的改革方案中，个体的给付（消费者导向的照顾方法）让受照顾者可以掌控自己所购买的服务，这是一种对于残疾和有知识能力障碍的照顾者来说特别有吸引力的方案，因为这些人其实还是依赖家庭照顾，通常是母亲或是年长的父母。

在这两个方案中，用现金支付取代照顾服务为的是发展出一种服务市场和推动营利服务。这也增加了弹性就业，对于劳动环境但公共的非营利服务影响相当大。

> 照顾儿童

澳大利亚被公认是第一个在 70 和 80 年代就实行国家儿童照顾政策的英语系国家。照顾提供者一开始都是非营利机构，但是 90 年代营利机构开始引进。而资金系统是一种资格审核的补助与管理机制，最后却没有办法和上涨的费用并驾齐驱，使得许多家庭无法使用儿童照顾服务。后来的自由派政府引进了改革，重新分配既有的资源、增加供给，但是补助大多是给女性的就业者。

上述的每一个方案都用正式给付的服务取代家庭照顾。另外一个被除了美国之外的所有 OECD 国家使用的方是公家补助父亲的育婴假。国家层级的方案最后在 2011 年引进澳洲，但是几年后又被换掉，取而代之的是新的限制资格的条件，排除那些本来就可以取得劳动资源的那些人。

> 新照顾典范的挑战

早期的福利国家对于家庭增加的照顾需求是诉诸于家庭有限的照顾能力，以及认为市场是失灵的。今日，政治人物寻求开创一个另外的照顾体系，是以被规范的、国家支持的市场为基础的照顾模式。在澳洲不同了规范市场的兴起会让政府的成本减少，因为取代了公共资金而已资格审查的方式让家庭去负担成本，并且透过低薪的营利照顾事业机制让整体变得“有效率”。虽然这个方式有些吸引力，好像增加了选择性，可是也有问题，主要是对于照顾工作者和被照顾者的安全问题，因为许多的工作环境和前景其实是堪忧的。

对于社会学家来说，这样的挑战是很重要的。若要超越理论，我们必须也理解这些新照顾系统的运作，同时不但要对于照顾提供、付费、忠诚、动机等的结果做出纪录和分析，也要对这个领域的劳动就业提出观察和诊断。■

来信给 Michael D. Fine
<michael.fine@mq.edu.au>

> 长期照护较

瑞典和日本的比较

by Hildegard Theobald, University of Vechta, 德国, ISA老化研究委员会委员(RC11)社会福利委员会委员 (RC19)
、Yayoi Saito, Osaka University, 日本



日本的人口急速老化。Pia Kieninger摄影。

从1980年开始，西方国家的长期照顾政策已经有了很大的结构转变，也对照顾工作者和照顾使用者产生很大的影响。许多国家都从彼此的政策经验中借镜。虽然在日本和瑞典的长期照顾方案是在不同的福利系统架构下产生了，家庭责任的观点，也就是瑞典的长期照顾取径，也在日本的长期照顾系统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在瑞典，早在1960年代就有了全面的公共服务，主要是对于年长者的社会照顾，并且逐渐扩张。后来在1982被社会服务法所正式规范进去。而法律规范了普遍的取用照顾服务的权利，也让地方政府有责任去确定有需要者确实受到照顾，不过这个法律也缺少了细节去明定

可使用资源的资格为何。从1980年代开始，财务的限制和人口的变化让公共照顾的涵盖范围已经降低不少，因为持续的增加去满足需求者的照顾需求。2012年有65%的65岁以上的老人使用公共住宅照顾服务，而5%住在照顾的小区里面。可是，若从一个国际的观点来看，那些公共照顾的涵盖范围仍然很大，私人的却只占5%。

在日本，老人的公共照顾也在1960年开始，但是只限于独居老人，并且是需要审核的。对于家庭责任的强调和限缩的社会权利限制了居家照顾的服务。从1989年开始，“10年推动老人照顾和福利计划”（金计划）给了以税为基础的居家照顾服务有了都市的规模，这主要是照

着瑞典的地方公共服务典范去实行的。可是，在扩大居家照顾这方面是有困难的，而且有限的都市资源和日本人对于增税的批判态度，这些因素的都导致了长期照顾保险(LTCI)于2000年产生。这混合了税和社会保险的财务方案。在LTCI的架构下，此方案让居住照顾和居家照顾可以同时提供给非常需要和没那么需要的两群人。这增加了受惠的人口。在2011年，几乎有13%的65岁以上的人口有使用照顾服务，4.4%使用居家照顾，5.4%使用照顾中心，3%住在照顾小区。2015年4月，一个新的改革方案试着去锁定最需要的那群人。这个改革增加了部份负担金额，对收入高的老人从10%增加到20%。

虽然照顾服务已经被市场化了，但是瑞典和日本的照顾都还是有公部门的资金支持。1990年代瑞典的公共小区和居家照顾服务体系也开放给私人的营利或非营利机构来加入，可是消费者的选择比较多是在都市的层级上。这些方案中，市区注册了不同的公共或私人照顾提供者，然后消费者可以选择。2012年为止，约有20%的居家照顾和小区照顾由营利的大公司所占。

在日本，LTCI开启了市场化的照顾服务，透过公共、营利、非营利的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小区照顾服务还是只有公共或非营利的组织经营。而我市区政府则负责运作，确保财务和税收，同时审核照顾提供者和额外税收。有了LTCI的照顾服务拓展，营利的照顾公司从2000年的30%增加到了2012年的63%。

而这些在公共支持的转变，以及照顾的基础结构的扩张和市场导向的改革。照顾工作者的处境也变化很多，特别是对于那些居家照顾工作者。最近对于两国这些人工作环境的调查揭露了高工作量和高表准化的工作内容。无论在

日本或是税点，居家照顾工作者的工作都在很紧的规划中被决定好的。在瑞典，公共长期照顾的式微、市场化的结构变等都对工作者有很大的反弹与批评。在日本，照顾工作者从来没有对这样的趋势那么负面评价过，因为照顾工作的扩张和公共的支持同时发生在市场化的时代。两国都有超过40%的工作者想要辞职，显示他们的不满。日本的工作者的不满可能来自工作量和低薪，而瑞典的结构性变迁则是不满的原因。■

来信寄给Hildegard Theobald
<hildegard.theobald@uni-vechta.de>
和Yayoi Saito <ysaito@hus.osaka-u.ac.jp>

> 奥地利和德国照顾工作的

by Roland Atzmüller, Johannes Kepler University Linz, 奥地利, ISA贫穷、社会福利、社会政策委员会委员(RC19); Brigitte Aulenbacher, Johannes Kepler University, Linz, 奥地利, ISA经济与社会委员会委员(RC02), RC19委员, 工作社会学委员(RC30), 女性与社会委员会委员(RC32), 第三届ISA论坛在地筹备委员会副主席(Vienna 2016); Almut Bachinger, 移民政策中心, Vienna, 奥地利; Fabienne Décieux, Johannes Kepler University Linz, 奥地利; Birgit Riegraf, University of Paderborn, 德国, RC02, RC19, RC30, 和RC32委员。



奥地利幼儿园的典型景象。Arbeiterkammer Oberösterreich, Austria摄影。

奥地利和德国是两个西欧的经济强权，也是两个保守的社会福利国家，现在正在经历结构重组。两者都要面对照顾和照顾工作增加的需求、责任、成本，特别是老人和儿童。两国也都在家庭和专业场域到了这样的挑战。

>>



五月一日是隐形劳动的一天！知名德国演员雕像穿着象征了看不见的劳动。Ida Schumacher。Birgit Erbe摄影。

>移民工的爆炸

多数的德国和奥地利的照顾工作是有家庭的女性无偿负担的。虽然女性劳动力参与的增加让家庭不再只有固定的模式，政府的现金照顾政策也把目标放在维持整个系统，透过动机和税收来维持。两国的移民女性通常的工作都是3C：清洁、照顾、烹饪。这个系统让传统的性别分工依然存在，并且让公部门的责任负担变小。

两国的边界、东西边收入的差异、以及拥有庞大的东欧工作人口，这鼓励了移民女性的就业。为了要管制所谓的24小时照顾，奥地利选择合法化这种家庭工作。德国则是包括了合法、半合法、非法的工作者。奥地利因为政治和经费上收到支持，以

及德国非正式的允许，和被照顾者居住在一起的照顾工作已经被建立了，并且出现短缺的情况。24小时的待命和很大的责任，加上社会孤立和低薪，这形塑了移民女性的工作样貌。

在两国，福利国家体制的协助下，中产阶级家庭可以使用得起照顾资源。东欧国家则有供给的瓶颈，特别是那些移民女性的家庭成员有照顾需要的时候更是如此。女性移民通常会在两个家庭内工作，并且通勤，往返工作国家和母国。

>公部门的照顾工作

特别是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撙节政策实行之后，专业的老人与儿童照顾工作变成了压力很大的职业，部份是因为新的私

人公司开始去削价竞争。此外，新公共管理的所谓理性化和重组的模式也让那些工作环境和工作流程要变得更有效率，但这会伤害质量。对老人照顾来说，不规律的工作排程让心理或是身体的支持没有办法达成，对于幼儿园来说，高质量的照顾也被遭的环境和大班级所抵销了。

老人和幼儿照顾的领域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无法罢工的，因为工作者不愿意让被照顾者被丢下。但是这样情况已经改变了，德国的幼儿园老师最近正在罢工，因为工作环境太差、薪水太低、地位太低。类似的罢工也发生在2009年的奥地利：“幼儿园集体反抗”（Kollektiv Kindertagenaufstand）。这样的罢工无非是为了争取更好的工作待遇。

>>

此外，工会也支持罢工，这是一种出现在德国和奥地利的新型集体行动。组织像是Care Mob, Care Revolution, Care Manifesto等等都结合了政治需求和对于照顾工作组织的批判，批判资本主义和诉求更美好的生活。

同时，照顾工作领域的理性化也和社会极化与新的劳动分工一起展开，例如在照顾管理和照顾提供者之间的分歧也带来了可能的分化。

>另一种照顾概念

最后，有些新的方案被提出来要去面对社会越来越多的照顾需求，同时提供适合的照顾工作组织。在地管理的小区照顾已经从1990年代开始成立，主要是提供有别于家庭护理和居家照顾的模式。

地方的照顾小区主要是由家庭成员所运作，这些人透过移动式的照顾服务来提供照顾。这样的方

式是以家庭照顾为蓝本，然后变成有偿劳动。许多的例子是中产阶级，提供了技术和机会去执行专业工作，但是有限的薪资也让雇佣关系变得紧张，有资格的人只做兼差的时数，而那些主要是女性移民的受雇者则负担最技术的部份。虽然这样处理的低薪和低社会地位的问题，但是也反应了这个工作是需要合法化保障的。

>照顾工作作为竞争场域

这些发展反应了两极化的影响，并且和西欧的福利国家体系重组有关。后者尚未被撙节政策所影响。而重组的福利国家制度也要求它们要更有生产力，促进经济成长，提高国际竞争力。一方面，所谓的“不具生产力”的支出也导致了非正式的族群化照顾服务分配的阶层化。另一方面，服从经济法则的福利分配也让照顾工作被经济竞争和未来职业投资的逻辑所影响。可是，我们的例子显示了个

人照顾、高质量工作、社会团结的降低是和照顾工作的组织方式有关的。并且这些例子也显示了从福利国家都投资型国家的路径激起不满的声浪，寻求组织照顾工作者和被照顾者，这这个领域变得更加竞争。■

来信寄给Brigitte Aulenbacher
<brigitte.aulenbacher@jku.at>
和Birgit Riegraf

<briegraf@mail.uni-paderborn.de>

> 危险环境下的 家庭照顾

智利、哥斯达黎加、西班牙

by Monica Budowski, University of Fribourg, 瑞士, ISA经济与社会委员会委员 (RC02), 贫穷、社会政策、社会福利委员会委员(RC19), 和社会指标研究委员会委员(RC55); Sebastian Schief, University of Fribourg, 瑞士; W. Daniel Vera Rojas, Pontifical Catholic University of Valparaiso, 智利(注1)



在哥斯达黎加的危险景象。W. Daniel Vera Rojas摄影。

不同社会用不同的方式组织照顾工作。家庭和其成员，特别是女人，提供了大部分的照顾。但是，照顾的组织也依赖于国家提供的服务、可购买的服务、和小区支持。我们的研究要问福利体系的组织原则如何形塑了智利、哥斯达黎加、西班牙等的照顾工作现况。

智利的社会福利体系原则是自由主义的，他们强调市场和个人责任。因此，我们期望家庭可以为一个单位去处理照顾议题，若有买得起的市场福利，那就依赖于性别化的家务分工。

哥斯达黎加的原则是社会民主，国家政策至关重要，家庭都会仰赖国家的服务和方案。西班牙则是结合了许多保守的原则，像是国家委派照顾服务给家庭（通常是女人），然后保护那些有工作的人（通常是男人）。所以在西班牙，儿童照顾是由家庭所负责，只有一些国家政策或是小区、朋友的帮助。而三个国家中，家务的性别化分工都是照顾提供的核心。当然，持续的经济危机也都是重要的因素。

> 在危险的家庭中照顾儿童

>>

对于所有三个国家的经济弱势群体（在贫穷在线一点，有变成贫穷人口的风险），我们都问他们每一户人家问题。这样的家户并没有被社会政策所照顾到，可是他们却也没有足够的经济条件去把照顾工作委托其他照顾者，像是送孩子到托儿所。而在2008和2010年间，我们访问了在3个城市的这群人口，每个国家的城市大概有24-31个家庭，目的是去探讨这些家庭成员怎么处理照顾的问题。

可接受的幼儿照顾有赖于家长，或是非正式、无偿的家庭支持，以及付费的幼儿照顾服务。私人（受补助的）的正式儿童照顾是在被认为对于儿童发展有利时才会被考虑，或是两个家长的收入可以支持这样的付费服务。受访者对于劳动市场于照顾工作中的利益是很暧昧的，像是长工时，差的工作环境、低薪、暂时受雇等等，这些都是不好的点，对于收入、安全、认同来说，也都相互抵销了。许多的受访者说到，传统的性别化劳动分工以及广被接受的“母职”，造成了工作和照顾之间的紧张。市场、国家、或是公民社会都没有没办法消解。

哥斯达黎加的家庭受访者是在我们探讨性别和代间劳动分工的对象。工作和儿童照顾是一种在家庭内女性代间的协商，并且总是以谁有比较多的收入为基准。有些女人非正式会付钱给照顾者。若有女人想要做全职的工作，其他的家庭成员不论是失业或是有兼差的，像是阿妈、亲家姊妹等，就会提供照顾。若需要家庭外的照顾，那么受访者相信国家和劳动市场可以填补这个空缺。哥国的劳动市场似乎有比较少的压力或是没那么复杂，特别是比较智利和西班牙之后。可是，男人基本上似乎比较少和照顾工作有关，女人也不认为他们有什么贡献。

在西班牙的家庭，女人把照顾工作一肩扛起。经济危机让工作机会变少，也削减的公共照顾服务的支出。其他的安全网则很少。在我们的受访者中，很少女人有小孩。而有小孩的女性则是批判性别化的劳动力分工，也抱怨有限的工作机会和可负担得起公共照顾服务。某些原因是由于经济危机。而熟人或是小区这时就会成为资源。许多受访者不生小孩就是为了响应这样的性别化分工不平等。

> 国家的比较

这样在不同国家经济弱势家庭的照顾比较主要有两个重点。第一，其强调了家庭对于照

顾工作的重要，以及性别化的家庭间和代间照顾的工作性质。第二，这计划也强调了福利体制对于家庭照顾工作的重要性。

对于多数的经济弱势家庭来说，性别化劳动市场，以及家庭组成和大小，这些都是儿童照顾的主要影响条件。不论这些性别化的角色被社会接受或质疑，也不论收入的机会或是国家支持是否存在，这些都会影响儿童照顾。哥国家庭导向的政策提供了建构三代家庭的成因，让照顾工作轻松些。智利则是在劳动条件、工作机会、照顾服务之间存在着紧张。在西班牙，有比较少或是没有小孩的家庭会减少女人的负担。同时，经济危机也减少了工作机会和照顾服务，所以女人只好一肩扛起。

照顾工作在哥国是比较压力没那么大的，因为女性的家庭成员可以分担做。智利的劳动条件、公共或私人照顾服务的缺乏，还有劳动性别化和传统性别意识形态让照顾工作变得困难。在西班牙，儿童照顾是压力最大的，是因为性别化劳动市场的不公平和经济危机导致的照顾服务短缺，以及工作缺乏所导致。■

来信寄给 Monica Budowski <monica.budowski@unifr.ch>

注1：瑞士的国科会补助了这项计划。University of Fribourg（瑞士）和 Public University of Pamplona（西班牙）、Catholic University of Temuco（智利），以及 University of Costa Rica（哥斯达黎加）一起合作这项计

> 南非照顾工作的限制

by Elena Moore, University of Cape Town and Jeremy Seekings, University of Cape Town, 南非, 前 ISA 区域都市发
委会副会长(RC21)和贫穷、社会福利、社会政策委员会委员(RC19)

在南非，高层的经济补助和身体照顾是需要的，也被提供了。那些失业、贫穷、AIDS 的大量人口代表了南非 5 千万人口之中有 3/4 需要照顾和经济的支持，这包括了大约 2 千万的小孩，3 百万的老人，1 百万残疾壮年，以及 1 千 2 百万的失业人口。

早在 1920 年代，南非开始建构福利体系，但是只给白人，这是以英国的税制系统、社会救助、照顾等为基础的，着重在“需要”的社会类别，像是女人和小孩。在南非，需要的合格公民定义是种族化的：南非的“非洲人”或是“黑人”人口是被排除的，不能拥有福利和社会公民身份，也没有投票权的政治权利。对于什么样的工作是非洲人可作的，和什么地区是他们可以居住的划分也是在强化种族迁移劳动系统，让许多劳工阶级家长必须离开小孩工作，小孩则给阿公阿妈带。到了 1970 年代之后，经济成长和政治稳定让种族隔离的社会慢慢开始把资源给有色人种，这个改变让照顾体系比较包容，到了第一次民主选举 (1994) 之后完成。

公共政策的去种族化，特别是社会补助方案、公共教育、公共卫生等，让福利国家变大且变得重分配化。这个福利国家是沿着市场成长和亲属关系所存在着的。

许多小孩仍然和继父母的家庭同住，3 个人之中只有 1 个南非小孩和亲生父亲住在一起，而大约有 5.5 百万的小孩并没有和亲生父母同住。亲人其实在照顾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同时，劳动力的女性化和变迁的亲属关系也会导致市场照顾服务的增加。大约 3-4 的岁小孩中有 30% 是到私

人照顾或是幼儿中心的。

国家提供了小学儿童照顾，也补助家长 (继父母也包括)，然后，在 2000 年早期，学龄前托儿所扩张了。现金补助的方案从补贴和成本的角度来说很特别 (和 GDP 有关)，甚至在比较巴西的 Bolsa Familia 方案时也是很特别的。

国家对于老人的支持主要透过老人年金。超过 1% 的 GDP 会分配给大概 3 百万领年金的人。而老人年金是要透过经济情况调查的，但是收入和财产的门坎也都很高，所以达到排富的效果。而后种族隔离时代政府对于老人的财务补助的扩张也和公共老人照顾的提供是有所冲突的。直接 (国家经营的老人之家) 和间接 (受补助的老人之家) 的老人照顾服务在民主转型过程中并没有留下来。而老人年金就对于照顾和家庭经济补助的政策有所影响，因为老人年金很多钱，有 3/4 的老人和有工作的成年人住一起，然而只有一些人和小孩住，没和有工作的人住。虽然老人财务上会支持年轻人，但是年轻的家庭成员却没有太多时间照顾老人。

壮年时期生病和残疾的人口，大约有一百万人，他们领取残废补助。AIDS 增加了工作年龄残疾的人数，这些人也要经济和身体的治疗。质化研究指出了 AIDS 受到亲属的限制，所以不论住得远近，其实都不适合求助。亲属照顾也持续是被性别化的，AIDS 则恶化此一现象。

南非提供了少数的公共支持给那些失业者。没有国家的支持，也没有能力透过市场取得服务，这些失业者只好依赖亲属。但是亲属的支持不再无条件的。而理想的

“不像北方的自由主义福利国家制度，南非的社会协助计划比较普及。”

结合与给定的亲属关系，也就是 40 多年前人类学家 Meyer Fortes 所描述的那样，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不论近的或远的亲戚，南非人民会区分有利与没有利的亲属。

南非的福利和照顾系统展现了和北方自由福利体系的某种相似性。国家的资源被导向社会扶助方案，着重在那些穷人上面。而国家也鼓励扩张的市场提供照顾，并透过年金、健保、私人看护等的管道取得服务。

然而不像北方的自由福利制度，南非的社会支持服务可以触及到更多的人。几乎三分之一的成人和小孩接受了这种福利，而三分之二的和家庭住一起的人有得到福利补助。所以这种福利补助可以触及约一半的南非家庭，包括了多数的贫穷人家。所以，这个制度很像北方国家的社会民主制度一样。

当虽然亲属关系在改变，而且支持也影响着个人的行为和态度，许多南非人民仍然依靠家里面的人来支持财务状况和身体照顾。这个意义上，南非和家庭为导向的南欧社会福利是很像的。

再过去几十年来社会福利的去种族化和亲属支持的改变已经让南非的社会福利体制成了更加民主了，但是国家从原本身体照顾（给老人长者）的限制性的角色撤退了，让人们要去依赖亲属，以及越来越依赖市场。■

来信寄给 Elena Moore <elena.moore@uct.ac.za>
和 Jeremy Seekings <jeremy.seekings@gmail.com>

> 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中的社会学

by the Public Sociology Laboratory, St. Petersburg, 俄罗斯



St. Petersburg Public Sociology Lab的成员。上列，从左到右：Maksim Alyukov, Kseniya Ermoshina, Svetlana Erpyleva, Ilya Matveev; 下列，从左到右：Andrey Nevsky, Natalya Savelyeva, Dilyara Valeeva, Oleg Zhuravlev.

公共社会学实验室是一个独立的研究组织，由 St. Petersburg 左派学者和运动者所组成。我们之中的一些人参加了学生抗议教育商品化的活动，也参加了反对在 2007-2008 年 Moscow State 大学的社会系的贪污和对科学的不敬，而其他成员则是参加了左派的政治和艺术的结社活动，并在不同的大学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在 2011 年，我们决定组织一个学者的社团，研究政治抗议行动，在 2011-2012 年做了一个大规模关于“公平选举”运动的研究之后，我们开始研究在 Kyiv 的 Ukrainian Maidan 和 Anti-Maidan 的运动，并和独立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http://cisr.ru/en/>)(CISR) 合作。这里我们主要聚焦在三个议题上。首先，我们要谈谈我们计划的发展脉络。第二，所谓的投身“公共社会学”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第三，我们活动面临到的制度限制，以及怎么克服。

> 俄罗斯社会学：在工具主义和专业主义之间

在我们的专业社会化过程之中，三种共识形成了，导致了两种社会学知识的类别：工具主义和专业主义。第一个的代表是科学研究院

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其并没有结构性的自主性，是政治效忠者的归宿，而且那些社会学系所被大学管理阶层策略地私有化了。在这些机构之中，学者必须处理市场的逻辑，像是为了商业需要而做研究，并且贩卖学位，或是参加一些伪科学的研究，像是“中产阶级研究”、“转型”、“俄罗斯的艰难时代”等等。

对于“官方”或是“工具”社会学的反应，一个“自主主义”的分支正在形成，他们认为“真正”的专业社会学不应该带入政治信念。从这个观点来说，工具社会学的两种形式都不是专业，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缺少了 Bourdieu 所说的自主性，也因为他们对于顾客的承诺使得他们无法专业。

我们对于工具主义的反对是一种对抗 Moscow State University 社会系政策的平台，但我们不同意去政治化的“专业人士”。和那些通常比学者更有反身性的运动者的合作，让我们从教条和精英的观点走开，也从方法论的教条走开了。社会学家 Victor Vakhshayn 是一个非常坚持“学术自主性”的人，他认为“俄罗斯的社会学语言已经被『新苏维埃』和『反苏维埃』”语言所取代。而且，对于俄国社会学来

说，建立一个“无信念”的科学是必要的（注1）。Vakhshayn 把社会学的任务看成是“为知识而生产知识”。任何社会科学的政治化都是对科学理性的伤害。

我们相信，这个观点并不是像是 Vakhshayn 所说的一种对“价值无关”的信念。相反地，我们相信这个位置是意识形态的，也是对于后苏维埃的新自由主义秩序来说最核心的。新自由主义展现了一种去政治化的意识形态，也是对于政治不满的素朴反应，还有公共领域的污名化，以及证成了退缩到个人空间的行动。Vakhshayn 的世代已经把这个“纯知识”的理想从他的老师那里继承了过来，是一种进阶的“布尔乔亚社会学批判”，对其来说慢像一个严谨的社会学知识是去判断苏联帝国崩解的原因，而不是被任何深层对于无信念的启法所引导的。他们把社会学看成是社会自我实现化的工具。可是，在去政治化的脉络之下，这个理论深度的理想被转化成了“纯知识”崇拜。

当俄罗斯社会开始在 2011-2012 年反 Putin、乌克兰战争和动员期间政治化的时候，专业社会学家也把目光转到抗议事件上面。然而，若没有科学的反身性反省，那只会再生产意识形态废话、或是硬把抗议的经验塞到理论的框框之中。

> 公共社会学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若是专业主义教师的世代是被 1980 年的悲剧社会变迁经验所启发的，而且若是“专业”也是被社会的在问题、退缩到私人领域，那么去政治化本身成为了一种存在问题，特别是当我们的朋友，也就是科学的环境和社会批评我们的行动的时候，特别是如此。所以那是我们为什么研究去政治化的原因。其架构是去了解公私领域的变迁关系。

此外，公共领域的研究也让我们和那些被研究讨论我们的研究成果，也就是那些浮现的公众们。所以，我们现在规划了一个会议，和在地的运动团体（主要是 2011-2012 年出现的那些）一起，交给他们我们的计划，希望可以引起一些讨论，建立网络。

我们相信

我们相信社会和政治问题是需要有新的社会理论的视野的。我们可以在不了解 anomie 这个概念的前提之下而了解涂尔干的作品吗？我

们可以探索更多 Arendt、Habermas、Fraser、Negt、Kluge 等人的公共性理论，但却没有先注意私领域的贫穷现象吗？我们的宣言说：“我们实验室的首要目标是去整合专业的社会研究方法和公共介入。而我们公共社会学实验室所提出的科学的问题是和社会问题相关的，连结到俄罗斯的政治处境和世界其他地方。此外，本实验室的任务也要结合社会介入和公民责任，具有理论和存在的深度，并透过经验研究去解决宏大理论的问题。例如，政治动员的研究让我们可以提出孤独与团结、个人主义与团结等问题。”

> 俄国的公共社会学阻碍

但是这样的位置在俄国很容易拿到吗？我想还是有些阻碍威胁着我们这个计划的生存。我们在专业主义和工具主义之间困住了，也在大学和市场之间被困住了。科学的机构，不论是中央级的研究院，或是先进的小型大学，都开启出了一种严格的阶层和职业节奏，可以自我再生产。这样的逻辑让合作和团结无法开展，因为研究者被原子化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 CISR 找到立足点，而且是俄罗斯最独立、草根、专业的社会学中心。奖励市场也在快速委缩，这是因为国家对于异议学者的压迫。例如，我们 The Politics of the Apolitical（致力于 2011-2012 年的抗议活动）的出版让政府想要把我们定位成“外国机构”。

所以，今天我们面临了更敌意的环境。目前我们已经依赖内部强大的道德和政治共识，但这是有限的。并且也依赖连结，依赖非正式的领导。可是，这些都还不够。我相信我们必须开一个“国际”的学者和艺术家社群，可以联合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到，从在地走向世界。



来信寄给公共社会学实验室

<publicsociologylab@gmail.com>

注 1：请见全球对话 2.3 期的 V. Vakhshayn's 和 2.5 期的 N.V. Romanovsky and Zh.T. Toshchenko 的回应。

> 早期苏维埃建筑中的社会主义

by Natalia Tregubova and Valentin Starikov, St. Petersburg State University, 俄罗斯

在俄国，“苏维埃”这个字意味着1)组织、结社、委员会；2)指导、推荐、建议；3)和谐、一致。作为一个词，其代表了一种特别的政治组织形态，在1917年的十月革命之后引进，并且激进地转变了政治权力：“工人、农民、军人代表的委员会”也被看成“苏维埃”。

苏维埃被想象成是一个治理的主体，并且由那些“劳动者”所选出了，而每一件事情都在集体的决策决定上开始。在苏维埃早期时代，这些“苏维埃”是被设计用来进行直接民主的。他们体现了社会生活的新原则：团结、集体、自主。但是在同时，这些原则是以前被压迫阶级的“独裁”上为基础的。

这个新的社会性需要一种新的日常生活的新形式，不论在城市或是乡村都是，也就是说，都是以工人或是农民的日常生活为主。大众教育和文化教育、城市移民、妇女解放、新政府形式，这些过程都要被镶嵌到日常生活中，并包括了空间组织。

这对于建筑师来说算是提出了一个相当有利的挑战，因为他们要去发明一种新的建造的形式和类别。因此，全球著名的苏维埃建构主义前卫建筑师在20和30年

代被社会和政治生活的现实所带了进来。

一个最大和最完美的建构主义计划在现在仍然看得到，是一个在St. Petersburg的Narvskaya Zastava区的一个住宅区。那是一个典型的20世纪的工人阶级郊区。Narvskaya Zastava有一件悲剧发生过，叫做“血腥星期日(Bloody Sunday)”，就是1905年和平的工人抗议被俄帝所镇压，而1917年的革命之后，这个事件被典范化了，变成了新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神圣印记。(图1)

Narvskaya Zastava变成了建筑的试验场，而且成了工业地带的—个大型公共中心。

Traktornaya街的住宅建筑(1925-27年所建造的)就是一个当时的优先建筑，那时候的建筑师试着去找新的空间组织的原则，同时也建造公共住宅给无产阶级。Traktornaya街是一个转变型态的建筑和城市规划的例子，因为那包括了俄国新古典主义和新前卫主义的混合，而在Traktornaya街开始展开了整个转变。(图2)

而第一个在列宁格勒时代的中学在1927设立，名字叫做革命周年纪念学校，是一所实验学校，采用新的学习和训练方式，让学生可以主动和自主，减少老师的数量。而学校有1000名学生，

包括了各种教室、实验室、甚至观星台。(图3)

这个新的建筑继承了功能主义的想法，注重公共场所的重要性。而第一个大型计划由工会运动所执行，那就是小区中心(1925-27)。小区中心提供了工人阶级聚会的场所，包括剧院、教室、运动场、图书馆。1930-32年的时候小区中心扩张到包括了职业训练学校，提供工人和年轻人机会去增进专业技能。(图4)

Narvskaya Zastava复合区域的中心是百货公司和餐厅(1929-31)。这些新的设施是设计去提供大量供给的快速可吃的食物和半成品食物用的(别和20世纪晚期的快餐店搞混了!)建筑物的组合显示了日常生活的动态一面，大的形式、不同的形状、垂直和水平交会的线等等。而大的玻璃百货公司是从接上可看到的，是一种激进公开、解放、团结的宣示，更是早期苏维埃意识形态的中心。(图5)

这个特殊的建构主义集合是在Kirov区苏维埃(1930-1935)的建筑物盖好的时候一起完成的，包括了市政会议厅。一个有权力和民主的地方政府的这种想法对于苏维埃的政治组织与论述在1920年代是相当核心的一部分。从很远的地方就看得到的，这个行政中心容纳了区政府、文化机构、银行、邮

局、议会厅等等。而且，其使用了该时代相当创新的功能和科技。然而，同一个时间，这个Kirov区的苏维埃可以被看成是苏维埃前卫的消亡：其半古典的门廊与其他细部是现代帝国建筑的特征，并且拥抱新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图6)

一些年之后，有一个很大的广场就盖在建筑物的前面，特别适用来给大众集会用的。1938年的时候，一个传奇的列宁格勒共产党领导人Sergei Kirov的铜像就放在这了。(图7)

一个很大的纪念Kirov (

其1934年的暗杀是斯大林苏联肃反运动到达高峰的前奏)的纪念碑代表了苏维埃建筑和社会的早期历史的终结。而下个时代需要另外一种建筑，推动了社会性的另外一种模式：大众而非群体，集权统治而非人民民主，服从的消费主义而非团结。象征上，一个容纳1000人的大会堂变成了电影院。

今天，也是一个世纪多之后，Narvskaya Zastava地区仍然是一个工业地区，主要是工人在住的。而中学、小区中心、房子、Kirov区的苏维埃建筑保留了主要

的功能，但是作为社交和集体活动的这点来说，重要性减低了。建构主义的建筑是被早期(帝国)的结构和晚期(斯大林和晚期苏维埃)之阴影所笼罩的，而且今日看起来还是相当古老的。(图8)■

来信寄给Natalia Tregubova
<natalya.tr@mail.ru>



图1: 在Narva Gate的工人抗议，这在Bloody Sunday, 1905的前一天。有卫兵看守着。创作者不详。



图2: Tractornaya街道旁的住家。



图3: 早期苏维埃的学校，有天文台。



图4: 早期苏维埃的小区中心。



图5: 早期苏维埃的“吃饭工厂”。



图6: Kirov District的苏维埃。



图7: 共产领导人的雕像: Sergei Kirov.



图8: 在Narva Square的斯大林主义建筑。

所有的相片, 除了第一张之外, 都是由Natalia Tregubova和Valentin Starikov摄影。

> 帮佣移民作为成年礼

by Zuzana Sekeráková Búriková, Masaryk University Brno, 捷克



从1990年代开始，帮佣成为斯洛伐克女性移民的途径。特殊的招募公司会找一个帮佣家庭，必且到London训练。这是在London的Victoria Bus Terminal，要把完成的帮佣载走。Zuzana Sekeráková Búriková摄影。

“帮佣”把由移民的家务劳动和国内或国际之间的文化交流连结在一起。按照英国的2004-2005年的法律来说，帮佣都是年轻的移民，特别是那些和家人住在一起来两年，而且是为了去学英文而找这个工作的。帮佣则被认为应该“和该家庭住一起”，接受食物、房间、零用钱（而

非工资），而该家庭则要把帮佣一视同仁。移民单位和组织都建议把他们当作自家人看待。

从1990早期开始，帮佣就成为了从后社会主义中欧和东欧的女性移民管道，特别是来自斯洛伐克的女性移民。而斯洛伐克也有密度最多的移民。媒体总是把帮佣描绘成是一种处理后社会主

>>

义转型的经济对策。在斯洛伐克，媒体每天都在报导，把经济困苦、高青年失业率和帮佣连结在一起，但也把连结到帮佣会讲外语和到国外旅行的这件事情上面。

然而 50 个斯洛伐克的帮佣访谈 (2004-2005 年于 London) 显示了他们的动机并不能被化约成经济策略而已。大体上来说，工作、赚钱、学英文的渴望是和其他个人议题交织在一起的，移民的决定是和家长、伴侣、朋友等息息相关的。若有人说她要当帮佣是因为要避免低薪的工厂工作，另外也有人会说她帮佣是因为刚经历不堪的分手而无法和前伴侣继续住在同一个地方。而帮佣的明显经济利益通常被更复杂和更隐微的动机所伪装起来。总体说来，说是为了要去学英文会比说是要逃避一段关系或是家人还要简单。

在迁徙之前，许多的斯洛伐克帮佣是和父母亲住在一起的。她们的帮佣家庭提供了一个绝佳可以是她们独立自主的管道，帮佣通常认为她们的帮佣期间是离开原生家庭和安定下来 (或是更希望成立自己的家庭)。她们把在国外的时间看成是一种冒险、试验、享受的机会，并且不汇款回家，也从不被期待这么做。她们赚到的钱都是私房钱，都用来享乐、赶时髦、参加派对、买礼物。许多人也把部份的收入存起来当作学英文用。许多人说在未来，她们会小心存钱，或是留给小孩。但现在，享乐是重要的，交友也是重要的，因为这是先进的消费文化一部份。

许多帮佣描述到这些实验是一个更大计划的一部分，他们待在国外，成为和家长独立出来的个体，只依赖自己的经验成为了成长和自我发展的过程中所学习到的课程。帮佣则时常比较他们和

军队的不同，在捷克，从军是义务。对许多女性来说，帮佣是一种成年礼，让他们准备好进入成年的独立阶段。

这样的自我理解对于帮佣来说有重要的影响和结果，因为这助长了许多人去忍受那些压迫的环境。而在帮佣和家庭主人之间的平等关系虽然被法律所鼓励，但是实际上不可能，因为权力总是不对等的。的确，86 人中的 82 个被帮佣的家庭并没有按照法律去做，被帮佣家庭时常要求超时工作，并且不付钱，或是忽略她们的自由时间与语言学习。有些帮佣更被期待要去和小孩子睡在同一个房间。

帮佣的移民身份、她们帮佣的家庭也是工作场所的这个事实，以及缺少语言的流利，加上妾身不明的位置，既非工人、也非客人、更非家人，这些都让她们在协商的时候没有权力去争取更好的待遇。对许多的帮佣来说，若要离开一个很差的帮佣家庭，那么就要面对三个很难的选择：找到新的家庭、找到英国其他工作、或是回到斯洛伐克。

即使帮佣遭到不平等对待或是剥削，他们还是愿意留下来，这种例子屡见不鲜。虽然有些帮佣提到了一些实际的理由，像是没钱回去，没有前景，并预设可以度过往后的难关。许多人描述到了在一个艰难的环境中待下来是代表一种成长，回去也并不会比较简单。吊诡的是。结构的不平等和对于成长的信念减少了他们抗拒剥削的坚持，也就是说，对于个人成长的努力可能也导致了自我减权 (disempowerment)。 ■

来信寄给 Zuzana Sekeráková Búriková

<burikova@fss.muni.cz>

> 在家教育

捷克教育的自由和限制

by Irena Kašparová, Masaryk University Brno, 捷克



在家上解剖學！Irena Kašparová攝影。

过去 20 年来，捷克的教育表现一直下滑，在许多的指标都是（如 PISA）。这个问题已经激起了国家对于教育的角色、方向、方法的辩论。大家不仅仅是不满比较的标准，还包括了更大的社会议题，像是缺少义务教育之外选择的自由，而父母亲认为他们也不满意主导的生活方式，也就工作和教育把父母和小孩在很早就分开了。

在共产时代之后，也就是个人主义被压迫的年代以后，一些人开始认为个体应该对自己和家庭负责。后共产政府已经开启了需多新的机会，包括的教育，于是在家教育出现了。

实践上，捷克的在家教育有很多的不同面向，从不教育（小孩教育自己）到在家遵循官方课程大纲的方式都有。虽然有证据显示过去 10 年来，捷克的父母越来越需求不同的教育选项，但还是很少数，不到 1%。

在共产时代（1947-1989），学生没有选

择，只能到公立学校去读 9 年的书。没有任何其他替代方案。因此，几乎所有的捷克父母亲（30 岁以上）是在共产意识形态下受教育的，强调平等、相同、服从、一致。

对许多父母亲来说，在家教育是一个新的东西，而且看起来是一个非常具有革命性的点子。在一些高教育程度的父母亲的奔走劝说下，在家教育已经于 2005 年合法化了。

在新的法律下，父母有权利在家教育小孩，不过限制在小学（1 年级到 5 年级）。法律的限制包括了：扮演教育者的父母亲必须拥有高中学历、要有一封来自官方机构教育心理咨询办公室的信函。父母教师也必须解释为什么他们想要在家教小孩，而且也要显示足够的学习空间（合适的家具、环境、空间），而小朋友也要参加官方的学校考试，每年至少两次。

法律提供了教育的自由，可是，同时也展现了国家想要控制教育自由的需求，能控制越多越好，他们藉由要求父母拥有文化和经济的资本。而父母和小孩则必须历经教育心理学办公室的一连串测验，这办公室就像国家的守门员，有审核资格的权力。有些父母说他们为了要拿到证明，已经拜访办公室太多次了。

为什么捷克的政府让这个咨询办公室可以决定在家教育的命运呢？这个办公室让主流以外的教育选项越少越好，不支持在家教育，以个人因素拒绝申请者，忽视系统性的事实，特别是经济资源的取得性。不像学校有资源分配给学生，教育者父母则没有国家的资源去支持家具、书籍、材料、食物等。在家教育的父母至少有一人

不能有全职工作，所以只适用于负担得起这种教育模式的家庭。

排除教育的概念是在政治和文化上相当敏感的。过去的在家教育被描述成是排除的，主要原因有二。第一，捷克的上贵族阶级可以去私立学校，所以革命时代被认为是一种特权。而这种社会阶级则在 1947 年革命之后分散在社会角落。新的政府认为在家教育是不需要的，因为人人接受平等的教育。

另外一方面，在共产主义之下，排除和在家教育有非常不同的意义。从革命之后的教育就非常注重一致性，容不下差异。小孩子若不服从权威，不论是身体或是心理上的，都不见容于主流教育体制之中。特殊的学校就是给那些不同的小孩的，包括了不同的族群，例如 Roma。若这些特殊学校没办法满足，那就在家接受教育。在共产年代，那些在家教育的小孩是不幸的，社会容不下他们。

现在，教育部长已经拒绝任何中等教育以上的在家教育了。他的立场显示了在家教育在捷克公众眼中的暧昧性。虽然去中心化和自由化的国家的确提供了在家教育

的法律和社会基础，但是其实践层次上却是非常选择性的。即使法律提供了替代选项的可能，可是其还是取决于国家，因此也抵销了可选择性的自由。就像在共产时代，其实排除只是一种比较松国家管控，还是不可取的。而其本身来说，我们都留下了一个难题：国家开启了包容的教育政策选项，容纳在家教育，可是同时控管的机制还是控制着在家教育，还是在进行排除。■

来信寄给 Irena Kašparová <irenakasparova@seznam.cz>

> 记忆捷克的Roma工人

by Kateřina Sidiropulu Janková, Masaryk University Brno, 捷克



在位于Prague的National Theatre Piazzeta的Roma工人展览。Michal Hečovský摄影。

那天是2013年的5月15日，我们站在Olomouc的广场上。这是一个位于Brno和Ostrava的城市，我们在这里起草Roma工人记忆的计划。那也是团队的第一次相遇。超过10个人，来自学术届、小区工人、老师等，一起围个圈圈，相互认识彼此。我想没有比这更好熟悉彼此的方式了，大家一起建立互信，然后一起工作。我们的目标是准备一个关于Slovak Roma工人的展览，他们在战后来到了捷克，我们想要把这些人的回忆串连起来。

“当我们走在城市的角落，我总是问年轻的女子说我想知道『Khatar sal』(你从哪来?)。因为我知道她们一定从某个地方来，并且家庭都在斯洛伐克，像我一样” Božena Dudi Kořová说。她是小区的工人，也是一位Roma

作家、运动者、工人的女儿。其父亲从1952年的斯洛伐克和乌克兰边界进入捷克。其他人同意了展览的名称，而我也很开心看到相机纪录到那一刻。

“你怎么拼Khatar sal?”我问，因为我的Roma语很差。我只知道基本的词汇，可以用来打招呼、表示尊敬。Roma语对我来说太复杂了。我上了5次课就不行了。Božena拼了，并说：“但是我们应该把展览称作Khatar san吗？因为用正式的词来描述年长者是一种习惯。”

在2014年的9月8日，我正在读我的开场演讲稿，我坐在一个木质房屋模型的前面，外面是粗糙的，里面则是捷克和Roma旗帜的颜

>>

色。大约有50人组成了群众，其中一个人是警察，擅长处理极端主义，这或许是我们告诉了警察说我们要展览，看看他们是否可以防范一些事情。我们其实不太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或是若有事情发生了，那是针对展览？还是针对我们。而Ostrava中央行政中心则拒绝给我们放置展览在主要广场的许可，也不和我们讨论。“难怪，”一位在Ostrava-V ítkovice的访客说，“他们觉得他们有责任维护Ostrava的形象，不想让其看起来像吉普赛。”

V ítkovice的青年则有不同的观点。“我很兴奋我们有这个最新的文化形式，在Ostrava没有其他人有。”

什么是最大的惊奇？在展期的5周之中，没有恶搞的行为发生。Roma工人的家庭盛装出席，并且观看和聆听他们亲戚和邻居的故事。一位流浪汉跟我们说谢谢，认为这是个很重要的经验。年轻的路人也用新颖的科技，当代的打扮，但也会很紧张，特别是我们接近想要跟他们说话。年长者则记忆起了1960年代的Roma同事，邻居、恋人等，而且所有许多Roma学生的小学校长，她并不识得Roma的旗帜，但也大方承认。

那是2015年2月9日，我收到了从捷克文化部寄来的电子邮件。文化部赞助了Roma工人记忆的计划。我们照承诺所说的，展出了三次，但是每一次展览都没有超过两个月，可是这个却是赞助的前提。在2014年的春天，我全心全意想要达到两个月的标准，可是遇到的阻碍，还有来自于政治的压力，所以我只好撤退，假装忘记了这两个月的要求。我被整个行政的程序搞得很头大，包括了要得到一个空间就要15个核准，而且有时候沟通时整个很困惑和不友善。我已经得到了两个团体愿意赞助接下来的展出，有一个独立的国外收藏家看到了我们的展览而且告诉我们他很欣赏，并且要

求我们解释那个回顾的电话是怎么运作的，要怎么拨打并且聆听那些Roma工人的经验叙事。

除了近一部展览的兴趣之外，那些也是对于族群关系、教育、对抗社会不平等、培力公民对话、处理“不合作自我”的年代里的差异等等议题的理论反思的贡献。我估计有2500人进来看过我们的展览，而在窗外看的则有数百人？我们当然不会认为这些都是徒劳的！可是从应用科学的角度来说，我们却是失败的。

所以我们开始准备另外的展览旅程。很幸运地，有一位支持者就在我们要关门的那一刻包下了所有的展览品，他想要把这些作品放到他家乡的公车站展示，那里是一个工业中心，也是少数Roma战后移民，从斯洛伐克而来，现在还留在那儿。1989年之后的租金飙涨，许多Roma移民离开到边缘的地区，这也是捷克城市的后社会主义常见景象之一。

创新应用的科学是最近几年来遇到最满意也最挫折的专业挑战。■

来信寄给Kateřina Sidiropulu Janků

<katerinasj@fss.muni.cz>

> 形塑世界规模的社会科学

by Ercüment Çelik, University of Freiburg, 德国, 劳工运动委员会(RC44)和社运、集体行动、社会变迁委员会(RC48)



35

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的GSP成员。New Delhi。Ercüment Çelik摄影。

在 过去 20 年间, 开创一个非霸权的世界规模社会科学已经成为了不论全球南方或北方的主要关怀。欧洲中心主义和全球南方社会学理论的兴起已经产生了许多辩论, 也看到了许多必须性还有机会, 这对于边陲和南方的国家可以透过相互学习和对话, 社会科学家专业和公共之间的交流而得以可能。

而有 13 年历史的全球研究计划 (GSP) 可以为这样的辩论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呢? 首先,

GSP 是一个 2 年的社会科学硕士班, 由许多大学一起合办, 包括 University of Freiburg, 德国; University of KwaZulu-Natal 后来改名为 University of Cape Town, 南非; FLACSO, 阿根廷; 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 印度;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泰国。课程包括了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劳动研究、国际关系、还有地理学。从 2002 年开始, 超过 300 名学生, 他们来自 60 个国家, 一起参加了这个 GSP, 每一位都参

>>

加了其中的3个学校。

透过这个国际的、跨学科的、跨文化的计划，学生经验了许多不同大学的传统，包括教学和学习都是如此。他们也经验了他们求学所在的社会，也重新看见了自己的社会。而最后的成果就是一个高质量的硕士学会，以及个人无可取代的宝贵生命经验，包括了上述所说的，以及各种在全球社会科学为基础上的价值。GSP的经验可以让学生了解什么是真正的“世界主义”，也就是跨文化的环境可以给予他们机会去学习更好的知识。不过这样的激荡，学生发展出了了解、包容、肯任“他者”的能力？不可避免的是，GSP已经变成了一个平台，在上面参加者发展和巩固了Ari Sitas所说的“和解的伦理”，强调自愿和合作，相互尊重。

而世界规模的社会科学实践需要跨文化的能力，这不只是对学生来说如此，老师也是，行政人员也是。这些人都被期待要去对于来自不同国家、制度、工作文化等背景的学生的需要有更多的敏锐度。准备好去协助这些学生是这个社会科学计划的一个核心面，这要鼓励参加者去看到学生，不要看成是负担，而是潜力。GSP的老师也是在实践“全球化公共”：有自信、社会的、跨文化的知识全球公民，他们将构成我们这个全球连结的社会。

一个非霸权的相互学习应该是这个计划的核心。一个人可以想象GSP在4个大陆上的合作的大学和每一个特殊的知识系统，从欧洲到全球南方，这对于全球链接的知识系统来说是多么完美的架构。Raewyn Connell说过在大城市的研究是被科学专业规范所限制，而走向全球包容的知识制度则是挑战。GSP在Freiburg大学来说就面临这个挑战。然而。尽管存在着制度限制，学者都设计出许多方式去创造更包容的学生，课程像是“现代性争论和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挑战”，“社会学家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南方观点”，“全球社会学的隐喻、诗学、叙事”，学生反应都很正面。来自北美、德国的学生写的批判性文章显示了他们的大学教育经验如何成为欧美知识结构体系的一环，以及他们以前对于这样的结构如何毫无所悉。

GSP在学术工作和公共实践之间的动态对话对于“公共社会学”来说是个贡献。当我们重新造访GSP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在不同的大学之间，学生被鼓励去从事田野调查，特别是

可以连结到社会核心问题的田野场域中去做田野。必须的实习经验也让她们参加到真正的工作和生活中，像是社运、NGO、小区组织、公会、学术、政治机构等等。用Michael Burawoy的话来说，“他们保留了和公民社会的连结”。学生成为了“有机”的GSP参加者。在许多案例之中，这些“公共”的参与发展出了学术工作和科学分析的素材和硕士论文的题目。GSP提供了平台给公共、政策、批判、专业社会学，特别是专业和公共社会学之间的对话。

GSP其中一个最大的限制是影响大学系统的市场。一个重要的议题就是对于学术人员来说日益增加的危险工作环境，这也损害了这个计划的稳定性。特别是在德国。中级的学术人员和行政人员没有工作保障，使得许多人即使有心想要做事，也得离开计划。

另外的议题是在不同大学之间的不平等权力关系。Freiburg大学有意无意地扮演了主要的角色。而未来我们期望合作的大学可以坚持平等的角色执行这个计划。的确，平等的结构对于GSP的成功是很重要的。

尽管有各种挑战，GSP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实践经验给了世界规模的社会科学，也鼓励了向边陲学习、实践相互理解、并开启了一个学术平台，社会学的想象可以和政治的想象结合。■

来信寄给 Ercüment Çelik
<ercumentcelik@gmail.com>

> 全球视野下的专业主义

打开黑盒子¹

By Ellen Kuhlmann, Karolinska Institutet, 瑞典; Tuba Agartan, Providence College, 美国; Debby Bonnin, University of Pretoria, 南非; Javier Pablo Hermo, University of Buenos Aires, 阿根廷; Elena Iarskaia-Smirnova, Higher School of Economics, Moscow, 俄国; Monika Lengauer, Technical University of Dortmund, 德国; Shaun Ruggunan, University of KwaZulu-Natal, 南非; and Virendra P. Singh, University of Allahabad, 印度; 所有作者都是ISA专业研究委员会成员(RC52)

全球化已经进行得相当彻底了，不管在范围上或是实践上，专业都被全球化了，特别是在新兴经济体中。快速发展的市场像是BRICS(巴西、俄国、印度、中国、南非)，以及其他中间收入的国家，也已经开创出专业领域的市场需求，不论在公共领域或是私领域都是如此，即使在西方世界的新自由主义在质疑福利国家的原则，以及撙节政策也影响到了专义务的政府资金支柱，整个大体的趋势仍然如此。

这些发展提供了“实时”研究的绝佳机会。我们研究专业在各种不同社会脉络下的变化，而同时也把专业从全球的视角去透视，这需要我们对专业和专业主义这两个概念的批判反省，这两个概念被镶嵌到二十世纪福利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情境之中。

虽然国家一直是专业社会学讨论中的核心概念，但是，社会学家鲜少发表对于地缘政治或是文化脉络下的国家或是公民身份对于专业的看法。最近的研究比较注意到了全球化和跨国治理的脉络、情境的跨国比较的领域，可是许多的讨论还是只有看西方国家，对于全球南方和东方国家并不注意。

我们试图去把既有的取径翻转过来，利用不同国家研究者的研究，包括南非、印度、阿根廷、俄国、土耳其、阿拉伯国家。虽然这样缺少了共同的“参考单位”和超越“福利国家专业”，可是我们可以提供专业发展的图像，并利用国家和专业作为一个整合主题为框架，去探讨两者的关系。

在阿拉伯国家，专业主义时常被描绘成一个普世的概念和目标。阿拉伯的专业人士(像是大学教授)讨论专业价值，其方式和60、70年代的功能论有惊人的相似性，都是把特征当作诚信或是社会责任、目标、和知识工作。同

时，特征也是西方功能论的关键，像是专业组织，及其目标、控制、垄断等都不见了，这意味着普世的取径可能会策略性地动员去建立专业领域，但是专业还是缺少了科学研究的扎实基础，也没有公共掌控和国家支持的具体机制。

在土耳其和俄罗斯，中央集权的国家限制了专业群体和专业主义的范围。在这里，政策变迁在这两个国家都重塑了国家和专业的关系，尽管分别透国不同的途径。作为中级收入的国家，土耳其的新兴市场逻辑和消费主义已经增加了对于公共服务的需求。同时，从公共管理来的政策也试图去控制专业领域。在健康领域这是相当明显的趋势。新的管理政策增加了对于医生的控制，但是也开启了医疗专业和国家之间新的连结关系：政府引进了新的管理位置给医生，然而医生这个职业也把管理整合到了医学教育之中。

在俄国的1990年代，转业里面有几次大变迁。例如，社会工作专业成立了，结合了新的评价系统，创造了一种新的训练模式。虽然政府的低工资政策和性别化的社会工作文化限制了专业发展，新的市场驱动社会政治也推进的专业化：社工被要求去提供社会权利的取得和保证。结果，社工被整合到公共领域，而也受益于市场扩张。同时，社会工作者也缺乏定义自我认同的权力，也无法定位自己在市场化政策中的位置，而整个结构安排或许也转变了和客户的关系。

印度和南非正在历经经济成长，并且新兴的全球权力和国家也建立了更多元的治理架构。专业发展被权力和殖民历史所形塑，然后在两个国家都是如此，自由福利国家的昂革鲁萨克逊模式也导向了强大治理的专业模式，包括了掌控和取得都是如此。

在印度，法律专业是全球化的核心，也是

“许多对于专业的讨论仍然只有聚焦在西方，却对于南方或东方相当忽视。”

国家规范的重点，包括了规范法律事务所的市场竞争，以及限制外国律师的取得。而印度和外国律师两者都透过企业调查的新形式发展出了市场扩张的策略，印度并且变成了法律行业外包委外的目的地。这已经在 IT 产业和出版业发生很久了。这样的专业也已经开创出了一种精英专业的领域，然后侵蚀了法律专业的地位，无法和全球市场竞争。在这个精英场域，国家介入已经限制了重组专业的权力，这是由于全球企业政治所导致的后果。

南非的快速经济成长也伴随着专业主义和公共领域整合而形成了。后种族隔离政治包括了对于更包容的专业发展的强大需求。即使如此，专业仍然被性别、种族、族群不平等所形塑。在这里，专业人士已经可以动员强大的自我治理能力、从国家分离出来，保留了职业的垄断和掌控了专业领域的存取权力。再阶层化、市场化、管理变化也已经延伸到了性别和种族不平等里面了，尽管形式或法律以及国家支持的缺席，以及存在着新的用来推动包容的法律，情形仍然如此。最近的国家用来规范专业的介入，部份是国家转型的计划，可能挑战了长久存在的职业垄断，将机会大门敞开给以往被排除的社会群体。

最后，阿根廷的经济成长也提供了社会服务的扩张，伴随着越来越多元的治理。这里，历史上和欧洲很强的连结（特别是拉丁国家）形塑了公共领域的专业主义，这包括了新的高等教育跨国选项，特别是教育和研究所教育。专业群体也已经对于跨国市场做出了响应，透过创新的职业机会给专业人士，以及新的知识生

产过程，还有技术认证。这样的例子显示了全球化和跨国主义的巩固，以及强化专业主义作为一种变化的行动者和政策制定者。这不仅在国家的范围是如此，在国际上也是。

我们的个案研究包括了许多的专业领域，从高等教育、法律、媒体、社会工作，到医疗。虽然每个故事都是独特的，并且仍然进行中，但是每个都是全球视野下专业变迁理论的绝佳经验案例。■

来信寄给 Ellen Kuhlmann <ellen.kuhlmann@ki.se>

注 1: 这是由 ISA 专业委员会 (RC52) 所撰写的。更多的细节请参照 http://www.isa-sociology.org/pdfs/rc52_professions_in_world_perspective.pdf.

> 谢谢, Nacho!

by Izabela Barlinska, ISA 执行秘书, Madrid, 西班牙



José Ignacio Reguera, 也就是大家熟悉的 Nacho。

1987年的1月,有一个装满ISA档案的箱子从Amsterdam到了Madrid,而ISA的秘书处展开了新生命。我们迫不及待地把箱子拆封,开始为ISA第七届社会学世界大会做准备。在那时候,ISA只有2000名会员(今天则有6000人),整个大会的议程都是由打字机所打出来并传真出去的。

而就是 José Ignacio Reguera,我们都称

Nacho,他加入了我们。并且,工作了近30年。他现在决定要退休了。这三十个年头以来,Nacho建立了整个会员数据库,而到了网络时代,他也成为了ISA的第一个网站大师。谢谢你,Nacho!谢谢你为ISA的奉献与付出,让ISA从一个类似于家庭的办公室,发展到现在这种现代国际规模的组织。■